

漫话哲学丛书

中国寓言故事中的哲理

苗增瑞



2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国寓言故事中的哲理

苗 增 瑞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目 录

鲁国少儒	(1)
立木南门	(3)
射稽唱歌的效果	(5)
桓公服紫	(7)
患在鼠	(9)
踏水有道	(11)
曹刿论战	(13)
民以为大	(15)
万物一体	(16)
白马非马	(18)
画荻者	(19)
裁衣与年资	(21)
相马术	(23)
卜妻为裤	(25)
人和鱼雁	(26)
国有不祥之兆	(28)
三人市虎	(30)
五十步笑百步	(31)
一洞之“网”	(33)

抓住牛鼻环	(35)
豕虱濡濡	(37)
道学先生	(38)
凿湖溶水	(40)
丑妇效颦	(41)
扁鹊治病	(43)
内科与外科	(45)
浑沌被凿窍	(46)
两小儿辩日	(49)
九方堙相马	(51)
任公子钓鱼	(53)
杯弓蛇影	(55)
爱人与害人	(56)
恶有满而不覆者	(58)
以鳆代鵠	(60)
高下之争	(63)
苛政猛于虎	(64)
祸福相反	(66)
不见其妻	(68)
不嫁人与不做官	(71)
宋王与使者	(73)
欲速则不达	(75)
庖丁解牛	(77)
宣王好射	(79)

王良驾车	(81)
钱与物	(83)
知人善任	(85)
孔子论弟子	(88)
疑人不疑己	(89)
安知鱼乐	(91)
屠龙之技	(92)
鲁公养鸟与赵襄子驾车	(94)
荆人涉澭	(95)
钱可通神	(97)
宋人学盗	(98)
三虱相讼	(100)
余桃啖君	(101)
冒牌神君	(103)

庄子回答说：“据我所知，戴面罩帽子的儒士，知道天地；穿着方头鞋的儒士知道地恩；戴着深玉的墨士多谋善断。可是真正有学问的儒士，未必穿褶服，穿褶服的人，未必轻于物。怎教不信，可以号令全国，没有这方面学问而仍穿褶服者，可判死刑”。再看真正的儒士家不多，于是，鲁哀公照此号令全国。果然，五天以后，朝堂再也没有穿褶服的人了。独有七位老者，一心想要立于廊门之外，鲁哀公急招他入宫，询问原因，原来他们是文采、制礼、射仪、手书万言

鲁国少儒

“鲁国少儒”选自《庄子·田子方篇》。庄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是先秦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很多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篇文章就是其中之一。

一天，庄子晋见鲁哀公，哀公说：“在鲁国儒士是很多的，可是崇尚你们道家学说的人极少，这是为什么？”庄子反驳说：“不对，鲁国的儒士是很少的。”哀公听了很不高兴，他说：“鲁国上下尽是穿儒服的，怎能说儒士少呢？”

庄子回答说：“据我所知，戴圆形帽子的儒士，知道天时；穿着方头鞋的儒士知晓地理；身着佩玉的儒士多谋善断。可是真正有学问的儒士，未必穿着儒服。穿儒服的人，未必有学问。您若不信，可以号令全国，‘没有这方面学问而仍穿这些服装者，可判死罪’，再看看真正的儒士多不多。”于是，鲁哀公照此号令全国。果然，五天以后，鲁国再没有敢穿儒服的人了。独有一位老者，仍穿儒服立于宫门之外，鲁哀公急招他入宫询问国事，老者满腹文章，对答如流，千转万变。

而不穷尽。庄子说：“鲁国的真正儒士仅此一人，能说儒士多吗？”

世界上的事，内容和形式是对立统一的。内容是构成事物的要素、成份。形式是要素的结构或表现方式。两者不可分割。一般说来，内容是基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并服从于内容。我们看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注意事物的内容，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儒士，要看他是否懂得儒家的学问，而不是看是否穿着儒服。鲁哀公就是忽略了内容而造成认识上的错误。应当指出，颠倒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片面地追求形式，就要犯形式主义错误，甚至会闹出笑话来。

明代杨慎所著《艺林伐山》卷七中的“按图索骥”就是因为颠倒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而闹出了笑话。

著名相马家伯乐，晚年时把他的相马经验写成《相马经》，其中谈到千里马的特征时写道：“额头高高隆起，眼睛突出像铜钱一样又大又圆，蹄子如垒起的酒药饼端端正正。”伯乐的儿子为了学相马，拿着《相马经》去寻千里马，结果找到一只大蟾蜍（癞蛤蟆），兴冲冲地回家对他父亲说：“我找到一匹宝马，和《相马经》上写的差不多，只是蹄子不大像。”说着将蟾蜍拿给伯乐看。弄得伯乐啼笑皆非，他知自己儿子

愚蠢，只得对他说：“可惜这匹马只会跳，不能驾车。”

《相马经》是伯乐一生实践经验的总结，学习它也必须结合实践来学。伯乐的儿子则是死记硬背，生吞活剥，采用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把理论和实际完全割裂开来。如从形式和内容上说，他追求的仅是形式，似乎一切高额头、大眼睛的都是千里驹，没有从内容上区分马和蛤蟆的本质特征，做出了滑天下之大稽的蠢事。

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它告诉我们，不论写文章、作报告，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真实、丰富的内容，言之有物，不能哗众取宠、空话连篇，要力戒空谈，反对那种徒具形式而缺乏内容的东西。

立木南门

《立木南门》选自我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商君列传》，讲述了战国时伟大政治家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革新的故事。

商鞅制定的新法已经完成，还未公布。他唯

恐老百姓不能信赖自己，于是在国都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并贴出告示说：“如果有人能将此木杆徒手移到北门的，赏赐十金。”但没有人敢贸然移动。商鞅又说：“谁能移动此木杆到北门，赏金五十。”这时有一人应声而出，将木杆移到北门。商鞅当众赏赐五十金，表示自己言而有信。事后，才颁布了新法。

商鞅立木南门，是为了取信于民，一方面表示自己改革的决心，同时也取得百姓对变法的支持。这种做法很有见地，他在秦两次推行变法革新，前后达十余年，使秦大治，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

商鞅提出的一些变法内容和措施虽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他言而有信，取信于民，是难能可贵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英雄人物离开了人民群众都将一事无成。立木南门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干任何工作，要想得到人民的支持、信赖，首先要在群众中建立起自己的威信，要说话算数，而不能朝令夕改，失信于民。对一个政党和国家政权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射稽唱歌的效果

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荀卿的弟子，主张改革变法，励精图治，写了不少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著作。这篇《射稽唱歌的效果》选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包括着深刻的哲理。

宋国和齐国是敌对的国家，为了备战，宋国大规模地营建练兵场。

一天，一个叫癸的歌手在劳动中引吭高歌，动人的旋律使过往的行人停下脚步，使劳动中的工人忘记了疲倦。宋王知道后，招见并赏赐了他。癸对宋王说：“我的老师射稽唱歌的天才和造诣远远超过我。”宋王就派射稽到工地去唱歌。结果，影响甚微，行人没有顿足，工人也感到疲倦。宋王对癸说：“你老师歌唱的技能远不如你，行者没有止步，干活的也感到疲劳，你为什么还称赞他呢？”癸回答说：“请大王检查一下我们的实际功效罢。我歌唱时，工人们只筑了四块板墙，而我老师唱歌时，工人筑了八块板墙；验证板墙的坚实程度，我唱歌时筑的墙，

用手指头可以插进去五寸，而我老师唱歌时筑的墙，只可插进去二寸。”

是癸的唱歌效果好呢，还是射稽唱歌的效果好呢，对此可有许多不同的答案，宋王的看法和癸的看法就不相同。但真理只有一个，判断真理的标准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不论从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看，射稽的效果都远高于癸的。

这里还可以讲一个故事，做一个反证明。韩非在本篇中还讲了个“画鬼最易”的故事。

有个客人为齐王作画，齐王问他：“画什么东西最难呢？”客人说：“画狗和马最难。”齐王问：“画什么东西最容易呢？”客人说：“画妖魔鬼怪最容易。因为狗和马，人们整天和它打交道、最熟悉它，画的不像，一看就知道，所以难画。妖魔鬼怪是不存在的，谁也没有见过。画成什么样子，人们也无从指责，所以最容易。”

为什么画鬼最易，因为大千世界上根本没有鬼，它不能接受实践的检验，无法做出判定。

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显然，要判断主观思想和客观实际是否符合，只在主观范围内兜圈子是不行的。实践则是沟通主观和客观的“桥梁”、“纽带”。因此只有依靠人们的社会实践，通过实践结果来检验人的认识是否正

确。这就是癸在前则故事里使用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常会发生认识不同的冲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或是“有权就有理”，地位越高，权力越大，似乎掌握的真理越多；或是某人的认识符合“书本”、“条条”的就有理，是不是真的有理呢？还是拿到社会实践中去验证吧。

桓公服紫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两个故事，一个是“桓公服紫”，一个是“邹君断缨”都说的是若要治理国政，位居庙堂者要以身作则的道理。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结果举国上下效仿，都穿起了紫色衣服。当时五件素白色衣服的价格抵不上一件紫色衣服。齐桓公为此感到忧愁，对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色衣服，紫色的就贵了起来，全国的老百姓现都穿紫色衣服，你看我怎么办？”管仲说：“君王能试试不穿紫色衣服，还可以对周围人说我讨厌紫色衣服的臭味。如果有穿紫色衣服的人来见您，您就叫他回退，说我嫌紫衣的气味。”桓公说：“对，照此办理。”当天，宫中的侍从近卫官就

没人穿紫色衣服了。第二天，整个都城见不到紫衣服了，至第三日，国境之内再没有穿紫色衣服的了。

“邹君断缨”是说邹国国君喜欢穿戴有长带子（缨）的帽子，周围的人也争相效仿，这样带长缨的帽子就很贵。邹君很担心，问左右，长缨帽为什么这么贵。周围人说：“君主喜欢它，百姓也跟着喜欢它，帽子自然就贵了。”邹君听后就将自己帽后的长缨剪下，然后走上大街，大家看到君主的长缨剪掉，也纷纷效仿，全国再没有戴这种长缨帽的了。

韩非子说国君不能用行政命令禁止百姓戴长缨帽，于是自己断缨做出样子，虽然国君自己受点委屈，但老百姓都跟着去做，这是一个好方法。韩非子的评论是有道理的，很多事情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命令来解决，尤其是改变社会风气更不能单纯用行政手段。领导工作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推动，颁布命令或指示；一种是带动，以身作则。当使用第一种方法时，自己也应当首先模范地遵守。领导者由于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若能遇事严于律己，处处起表率作用，对周围和社会的影响往往要比一纸命令大得多。历代统治阶级都懂得“若安天下者必先正其身”，“已不正焉能正人”的道理，那么无产阶级的领

导干部就更应当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力，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社会风气自然会越来越好。

患 在 鼠

我们常讲看问题办事情都要“两点论”，而不能“一点论”。那么，什么是“两点论”和“一点论”呢？

明朝的开国元勋刘基写了不少寓言，在《郁离子》中有一个《捕鼠》的故事。赵人家中老鼠成灾，粮食家具损坏很多，他到中山地方借了一只猫来。这只猫很会捕鼠可是也爱偷鸡，一个月的功夫，老鼠没有了，鸡也被吃光了。赵人的儿子很烦脑，问他父亲“何不把猫送回去？”赵人说：“其中的道理不是你所能知道的。我们忧虑的是鼠害，而不是没有鸡。有老鼠，就偷粮食，毁衣服，墙被穿成洞，器皿被咬坏，这样，我们就忍饥受冻了。远远超过没鸡的害处，没鸡，不吃算了，总不至于受饥寒呀！为什么要把猫送回去呢？”

事情总是这样，有一利，必有一弊，有一得，必有一失，这就是两点论。赵人的儿子，只看到

弊，没看到利，没有鸡肉吃就闹着要把猫送回去。他父亲看问题就比较全面，权衡利弊，决定取舍，这是正确的方法。

同样，明代浮白斋主人的《雅谑》里有一个《羊裘在念》的故事，也是讲了一点论的偏颇。

乡里有个小偷，一日夜间到迂公的住处窥探，正好被迂公遇上，小偷大为惊恐，将别处窃来的羊裘也丢在地上仓惶逃窜。迂公拾得羊裘大喜过望。自此，心里总是想着羊裘，每日晚上回家，看到家门静悄悄的安然无恙，就皱起眉来叹息“为什么没有贼来呢？”

迂公遇贼拾得羊裘皮袄，这是件偶然意外的事，即使下次真的再遇上贼，也不会再得一件羊裘皮袄，他天天盼望小偷再来，说明他不懂得必然与偶然的关系。另外，迂公确实迂腐得很，他只想着从小偷那里再得到一件皮袄，却没想到小偷将给他带来的损失，只看到偶然得利的一面，没看见遭到损失的另一方面，这是典型的一点论。

真理是全面的，事物都是由两方面组成的矛盾统一体，好事与坏事，福与祸，得与失，成功与失败，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两点论或叫矛盾论。它既是观点，又是方法，是认识事物和处理工作的方法。它告诉人们观察事物，研究问

题时要注意全面性，注意分清矛盾两方面的主要次要地位和它们的关系，不要像赵人的儿子和迂公那样，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以偏概全，而要象赵人那样看到两点，权衡得失，这样就会使自己处在主动的地位，促进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

踏水有道

《庄子·达生》篇讲了一段孔子的故事。一次，孔子带子弟到吕梁去观景，但见澎湃咆哮的洪水由悬崖绝壁倾泻下来，直落千丈，激起汹涌的白色泡沫，冲出四十余里。在这种地方，即使是鼋鼍和鱼鳖都是不能停留的。这时孔子却见有一汉子在水中游动，以为是有痛苦想自杀的人，忙叫子弟想办法迅速搭救。那汉子一会不见了，不久却在百步之外露出了头，披头散发唱起歌来，顺流游至水边。孔子也急忙跑至水边问道：“开始我以为你是水鬼呢，看了一会才知是人，你游的真好，请你说说游泳有什么规律吗？”汉子回答说：“我那有什么规律，不过是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罢了。每天在水中出没，在旋涡

中翻滚，只要能顺从水性而不乱来就行了。”孔子问：“什么叫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呢？”那汉子笑了笑说：“我生在河边，安于河边叫始乎故；常在水中游，了解水性，叫长乎性；我跳在水中自然而然的就慢慢游了起来，叫成乎命。”说完，他又畅游了起来。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唯心主义者，所以他常强调“天命”，宣扬要“知天命”，“畏天命”，人有“生而知之者”。而这个汉子是个带有自发性的唯物主义者，他所讲的“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是说要了解周围的环境，熟悉水的性能，在漂浮中逐渐掌握游泳的规律。人们常说“学游泳必须下水”。不管你在岸上能讲一大套游泳的道理，会做各种游泳的姿式，初下水还是要往下沉的，游泳只能在水中才能学会。

《吕氏春秋·察今》有一个“其父善游”的故事也说明这个问题。

有个人过江，看见一人拉着小孩，正要把孩子丢到江里去，孩子大声哭叫。这人连忙问道：“你怎么要把小孩丢到江里，难道不怕小孩淹死吗？”那人回答说：“不会的，因为他父亲很会游泳。”

父亲会游泳，难道儿子也一定会游泳吗？这